

# 德龄眼中的慈禧与清宫生活

清朝的宫闱秘闻，从来都是民间街头巷尾、茶余酒后的绝好谈资，但真正的紫禁城生活，外人很少能知道。不过，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却能把清末宫廷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和一个真实的慈禧太后展示在世人面前，她就是德龄公主。

## 最早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中国女性

德龄公主并非真正的公主。1904年，慈禧70岁万寿节期间，兴之所至，封德龄、容龄为郡主（即和硕格格）。后来，1911年，德龄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《清宫二年记》时，由于英语中没有公主、郡主之分，因缘际会，一个误会就此产生。

德龄公主是清末外交官裕庚的女儿。她和妹妹容龄自幼就随父出洋，先是在日本待了三年，之后又奔赴西欧，在英法等国度过了四年时光。在法国时，姐妹俩曾向著名的“现代舞之母”伊莎贝拉·邓肯学习舞蹈，成为邓肯甘愿不收学费的亲传弟子。她们经过东洋和西洋文明的洗礼，属于最早“睁眼看世界”的那批中国女性。

1902年冬，裕庚任期已满回到了国内，17岁的德龄和妹妹也随父留在北京。此时的慈禧已被外国人的枪炮悍兵吓破了胆，急欲讨好各国使节和夫人，得知裕庚的两个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后，便将她们召入宫中，充任一等女官，主要负责翻译和讲授西方礼节，还给光绪皇帝讲授英文。就这样，德龄和她的妹妹容龄身着鲜艳时髦的巴黎时装，

脚蹬红色高跟鞋，走进了死气沉沉的深宫，为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股时尚之风。

## 法国时装与旗袍的比较

人们通常认为，慈禧是一个说一不二、性情乖张之人，那么，姐妹俩的宫廷生活一定是战战兢兢，大气不敢出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德龄在她的一系列回忆这段宫廷生活的著作中，揭开了这个谜底。

首先是她们的着装。德龄姐妹的确是穿着法国时装，蹬着高跟鞋进宫觐见的。大概是出于客套，慈禧夸奖了她们们的服装，并且还亲自试了试德龄脚上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，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。

但是，没过多久，在慈禧生日那天，慈禧便命她们换上旗装。众人纷纷议论说，还是旗袍比外国的服装漂亮。慈禧指着园子里的葫芦开起了玩笑：“西洋的衣裳，穿起来就像这葫芦似的。全世界只有满洲的旗袍最美。”不过，也有一个人唱反调：“巴黎的服装比这好看多了！”此人就是光绪皇帝。德龄从这场微妙的服饰之争中，敏感地感受到了清廷内部的分歧。

## 慈禧当“油画模特”

德龄在神秘幽深的皇宫，近距离接触清朝最高统治者两年之久，说到清廷内幕，德龄自然是最有资格的。在她的书中，关于慈禧的饮食起居、服饰装扮、兴趣爱好、性情品格等都

有非常详尽的描绘，并且还涵盖了听政内幕和光绪皇帝的政见以及处境等宫廷秘闻。

很少人知道，慈禧太后可以算得上是油画艺术进入中国的第一位模特。这件事也是德龄促成的。当时的美国公使康格夫人、西班牙公使德卡赛夫人和其他的外国驻华使节夫人入宫拜见时，都由德龄姐妹陪同并担当翻译。德龄同康格夫人接洽，两人找来了美国著名女画家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。守旧的慈禧就这样做了一回先行者。

画像中的慈禧身着黄袍，手戴翡翠手镯一对及翡翠扳指，头戴玉蝴蝶及鲜花，神情恬然，整幅画笔法精致细腻，实为佳作。然而，她内心里对西洋画是排斥的，曾私下里对德龄说，中国人靠想象就能画得很好，外国人却偏得照着实物画，可见外国人笨得很。

## 性格复杂的慈禧

德龄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紫禁城，不一样的帝都气象，也看到了不一样的皇帝。比如，传言说光绪皇帝怯懦多疑又残忍刻毒，但德龄却不这么认为。她对光绪的回忆是饱含深情的，她说光绪皇帝是个非常有趣的人，会大笑，也懂得幽默，但一见到太后就马上变脸，变得一脸严肃，死气沉沉。他一直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智慧、才艺和品位，但德龄姐妹见证了他的多才多艺，见闻广博。

德龄看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光绪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在变法失败、痛失珍妃、被囚瀛台之后，他表面上“一切听皇爸爸的”，其实内心并没有放弃。有一天，光绪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去找德龄，问她：“姑娘见多识广，去的国家多，可知这个人现在何处？”边说边摊开手心，上面写着一个“康”字。可惜德龄并不认识那

个字。光绪听了后，竟派人给德龄送去一本汉语字典！

在德龄公主的书中，慈禧太后当仁不让地成为着墨最多的人物。

她笔下的慈禧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老顽固、凶婆子形象，而是具有复杂的人格与心理深度。她时而冷酷、刁钻，草菅人命，比如太监梳头时如有头发掉落，就要把他打死；时而又表现得平易近人，冬天出游路滑，一轿夫跌倒将太后甩出轿外，却意外得到谅解。慈禧喜爱玉器与服饰的奢华，她的染发过程烦琐得超乎人们的想象，她还有服食人乳的习惯，保持着鲜嫩如少女的肌肤。这样不厌其烦的描述，将世人眼中高高在上的老佛爷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。

当然，德龄对于慈禧并不是一味地顺从，她在向太后讲解西方礼仪，介绍西方革新动态的同时，表达了革新的愿望，她希望“能看到中国自强起来，与世界各国并立”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德龄还表现出了对女性处境的关注，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。她在书中写到了中国女人的处境，女人大脚会被嘲笑，在客人面前大脚下面走过是一件晦气的事……性别偏见几乎无处不在，即使在一个开明的驻外公使家里，女性依然会受到很多限制，她们的出路常常是被选入宫中，或成为某个皇公贵族的玩物……

清王朝昔日的繁华终要忽焉散尽，德龄公主也于1905年3月离开皇宫。此时，父亲裕庚在上海病危，电召德龄姐妹赴沪探望。德龄姐妹向慈禧请辞，得到太后准许，遂离开北京去了上海。不久，父亲病故，德龄以“百日孝”为由，再也没有回到皇宫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## “我的脑袋要给中国人用”

1940年8月，钱伟长登上“俄国皇后”号邮船，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。在邮船的甲板上，他和一众留学生立下誓言：学成后定回国，凡是他们留学的专业，国家就不必再派人出国留学了。

三年后，1943年6月，钱伟长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，正式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，他与钱学森、郭永怀、林家翘一起师从“世界导弹之父”冯·卡门。

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。二战期间，伦敦遭受德国V1、V2导弹的威胁。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，美军方将任务交给喷射推进实验室。钱伟长等人经过研究分析，发现德国导弹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，多数落在伦敦东区，这说明德国导弹已采用最大射程攻击。据此，钱伟长提出，只要在伦敦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，以蒙蔽德国导弹仍按原射程攻击，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遭受破坏，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。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，赞赏“美国青年真厉害”，殊不知这一建议来自一位中国青年。

1946年，钱伟长与冯·卡门合作

发表《变扭率的扭转》一文。冯氏曾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。然而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，在同行眼里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。他履行了6年前出国时立下的誓言，放弃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，以探亲为名悄然回国。他说：“我的脑袋不应该给他们用。我的脑袋应该回来给中国人用。”

钱伟长受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。一般教授一周上6节课，他要上17节课，但拿的工资是15万元金圆券，只能买两个暖瓶，他不得不向同事、老同学借钱度日。

钱学森回国探亲，见钱伟长生活如此窘迫，就提到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还是希望他回去。由于生活所迫，他动了去美国的念头。不久他被告知，实验室愿他回去复职，并允诺可携全家去定居。钱伟长持邀请函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。签证官让他填写一张表格，需要回答一些问题。他按要求逐项填写，但最后一项他填不下去了，问题是：“假如中国和美国开战，你是否忠于美国？”钱伟长毫不犹豫地填了“NO”，就这样，他被拒签了。

据《同舟共进》梅兴无/文

